

快写人物

CHARACTER SKETCHER

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初,她常常听到老人们大喊“日本鬼子来了”;收集侵华日本老兵证言时,她也常常被老兵赶出家门。

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和施害者好像都不欢迎她。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她以追寻历史真相的真诚,以女性温柔的力量打动双方,他们都说出了历史的证言。

从1988年起,她走访了约35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250位侵华日本老兵,出版证言、摄制纪实电影、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日本举行证言集会……

她是日本人松冈环,一个被称为“日本的良心”的女性,一个对遗忘说不的人。

时隔四年,她再次来到南京,看望她的老朋友们。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间关系的亲密、熟络,印证着她这些年来为抚平战争伤痕所做出的努力。

现代快报+记者 张然 徐梦云/文
郑芮/摄



扫码看视频

松冈环： 对遗忘说不



松冈环与余惠霞三姐妹合影留念



松冈环为潘巧英戴上围巾



松冈环在收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

赴约

12月15日,南京,小雨。

76岁的松冈环撑着伞,顶着风,走在异乡熟悉的街头。这次来南京,她的主要目的是赴一场跨越四年的约会。

她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眼镜,身材瘦小,走在人群中很容易被湮没,但她一开口,就会让人倍感亲切。

“四年没见了,身体还好吗?”“你还和以前一样,一点没老。”她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家属们,熟练地打着招呼,就像许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

这天,她第一站来到了余惠霞家,看望她们三姐妹。她们的父亲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

2022年6月7日,余昌祥与世长辞,并捐献了遗体。余惠霞拿出父亲的老照片,松冈环不禁回忆起往事。在2014年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上,她第一次见到了余昌祥。

余惠霞告诉记者,其实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经历,一直是父亲不忍揭开的伤疤,即使在家里他也很少提起。直到2010年,在女儿余惠霞的劝说下,余昌祥决定公开自己的经历,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之后,他经常出席活动,讲述自己在1937年的遭遇。

“这是父亲清醒时候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余昌祥满头白发,端坐在轮椅上。

“这张照片发给我,留作纪念吧。”松冈环说。

一家接着一家,松冈环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而她也仿佛有用不完的精神。下一站,前往汤山神家庄,那里住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潘巧英。

92岁的老人,听说松冈环要来看望她,一早就走到门口相迎。

这次来看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除了准备了慰问金,松冈环还贴心地给每位老人准备了一条围巾。“围巾拆开看看喜欢吗?”松冈环拿出围巾给潘巧英老人戴上。

为了和红色围巾相配,潘巧英进屋重新换了件红色的外衣,“穿这件更合适,我们一起照张照片。”

两人留下了一张合影,约定明年春天再见。

初见

然而,松冈环和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初见,并没有这么美好。

20世纪80年代,还是小学教师的松冈环发现日本的教科书中,关于二战部分写的全是日本受害的事,关于日本侵略他国的历史几乎没有。

她对这种很容易就被看破的、选择性的遗忘感到震惊。

书里没有历史的真相,那就自己去找。1988年,她首次到访南京,所见所闻让她大受震动。

回到日本后,松冈环创建了追查、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市民团体——铭心会。

大规模的调查从1997年开始,松冈环和她的翻译通过广撒网的方法在南京各处转,只要看到80岁左右的老人,就马上问他们,“1937年,你不在南京?”

这时候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

了60年,但这些南京老人的反应依旧强烈。

“1937年后他们可能没再见过日本人,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有的人很惊讶,有的人很害怕,喊着‘日本鬼子来了’,躲在厕所里不肯出来。也有一部分老人说看到日本人就感到恶心,就叫我不让我进家门。”遇上这种情况,松冈环马上就走,但是她也不会轻易放弃,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地再去回访,最终,基本上所有的幸存者都接受了她的采访,“虽然有的老人会说,这一辈子都恨日本人,但是我慢慢地跟他们接触,让他们讲出来以后,他们也会在内心对我们产生一种希望,希望我们把他们受害的情况带回去,告诉更多日本人。现在,我跟幸存者的关系都特别好,我想他们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一部分日本人的真情。”

松冈环的证言调查不局限于南京的受害者,同样包括日本的加害方。而让日本侵华老兵开口,要更加艰难。

“我调查老兵的方法,就是先找到老兵,然后通过老兵介绍老兵,介绍他的战友。很遗憾的是,一开始很多人都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或者他就是不想说。”一次碰壁,第二次松冈环就带着礼品去,不直奔主题,而是从入伍、到南京之前的情况开始聊起。

让松冈环印象深刻的是,她曾在8年间去侵华日军士兵松村芳治家采访过20多次,松村芳治一直坦白承认自己的杀人罪行,但一直到了弥留之际,他才吐露自己曾经在中国强奸过妇女,说的时候老泪纵横。“他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行,觉得自己是为祖国而战的士兵,后来才发现,确实是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对战争认知的变化,也让我意识到调查南京大屠杀证言的意义所在。”

抗争

迄今为止,松冈环走访了约35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250位侵华日军老兵。她发现,在受害者和加害方的双向调查中,很多案例可以互证,包括时间、地点、屠杀和强奸的形式,都可以互相对应。

比如差点被遗漏的南京太平门大屠杀,松冈环从侵华日军士兵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以及几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中得知,侵华日军曾在太平门屠杀了约1300名中国人。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向她证实了这一点,太平门一带确实存在万人坑。中日双方的证词完全可以对上,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

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2002年,松冈环编著的第一本南京大屠杀证言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问世。次年,《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出版。

时至今日,她已经出版了6本南京大屠杀相关书籍,拍摄制作了《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太平门消失的1300人》《南京的松村伍长》等3部纪录片。这些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穿了日本国内那些妄图否认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分子的谎言,松冈环也因此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猛烈攻击,她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全部被曝光在网上,路上多次被人跟踪。但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教师,却从未停下追寻历史真

相的步伐,“我曾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承诺过,要让日本政府承认大屠杀历史,让更多日本人知道大屠杀真相。”

对话

现代快报:时隔四年,您再次来看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松冈环:疫情之前,我们每年都会上门看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我们称之为“心灵的抚慰”。这四年来,我在日本也一直挂念着,总是会想到老人们怎么样了,身体好不好。这次再来,我感觉老人们年纪很大了,所以对他们的关怀更加迫切。

现代快报:35年来,为了讲述这段历史真相,您付出了很多。这一路走来,您有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吗?

松冈环:做日本老兵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时,我还没有退休,基本是利用教师的假期去做访问。确实也有过觉得很累想放弃的时候,比如有的时候,出去转了一整天,发现名单上的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或者是被他们骂出门。这样慢慢也就积累了一些精神上的压力,突然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不想出去了,不想再坚持这个工作。

后来,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老人们约定来南京看他们,他们和我说,你是老师,你采访了我们,整理了我们这么多证言,你有责任把我们的证言传达给年轻人。听到幸存者老人们的希望,我最终还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这项工作不能停止,所以又重新开始证言的收集。

现代快报:您曾经走访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大约350位,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有38位了,您觉得,讲述这一段历史,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松冈环:我们发掘幸存者的证言,是想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一开始,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幸存者能活着亲眼看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或者赔偿。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觉得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所以我们转向了坚持27年的“心灵抚慰”活动。

这二十几年来,通过请幸存者吃饭、带他们旅游、去家里慰问的形式,希望可以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会告诉幸存者,作为加害方的日本人,我们是知道这段历史的,这是对受害一方最好的心灵抚慰,我们会把这样的工作一直坚持下去。

现代快报:在日本,有没有年轻人通过加入铭心会传播这段历史?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了解有没有增加?

松冈环:给年轻人传达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之前每年来自日本的访华团都会邀请一些学生。但是现在,年轻人正慢慢地不关心历史。

虽然有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通过展览、海报等方式向年轻人介绍这段历史。2010年,我们开始在集会上放映电影、纪录片,希望年轻人来得多一点,尽管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我们还在努力。

12月9日,我们在大阪举行了“延续南京记忆会”放映会,面向日本公众首次放映纪录片《罗伯特·威尔逊:为南京缝合创伤》,现场来了大约120人,有一半人写了感想,他们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感到震惊,对中国民众受到的巨大伤害感到心痛。(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